

最早期中国青铜器

夏代二里头文化



戴克成着

作者戴克成

授勳:

- 1996: 法国国家艺术文学骑士勋章
- 1998: 法国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 2001: 法国国家模范军官勋章
- 2006: 法国国家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 2011: 法国国家模范司令勋章

出版书目:

- 甲骨文, 书目随笔与学术报告。法国远东学院出版, 第106册巴黎1976。
- 中国青铜器, 瑞士费力堡图书办公室 (英文, 法文, 德文版)。
- 古中国青铜器, 第一册: 夏, 商代, 巴黎1995有彩色, 黑白附图超过370枚。为后来全套一式三册之第一册。第二册记述周代青铜器。第三册记述汉代青铜器。
- 中国古代金器, 与陕西省考古研究中心局长韩伟教授共同编写。巴黎阿里斯2001年10月。
- 玫茵堂珍藏之中国古青铜器, 第一册, 附册及第二册。香港2013。
- 中国古青铜器浅释, 青铜器在中国文化的重要角色, 形制, 用途与纹饰, 巴黎2015 (英, 法, 中文版)。
- 以及自1985年以来眾多展览会展品目录。

捐獻:

- 大量捐獻予巴黎吉美博物館。
- 大量捐獻予巴黎賽奴奇博物館。
- 1993年捐獻一項11世紀遼代半鏤銀盒子陝西省歷史博物館。
- 2015年捐獻28塊公元前8世纪东周初期金箔饰片予甘肅省博物館

封面內頁: 牌飾玫茵堂珍藏

攝影: Vincent Girier Dufoumier (p. 6, 37, 38, 41, 46, 49, 51, 55, 56, 57, 60, 61, 62)。

製作與設計: Clémence Artur

插图: Vincent Pradier (p. 12, 19, 22, 23, 25, 26, 27, 44, 47, 52, 53,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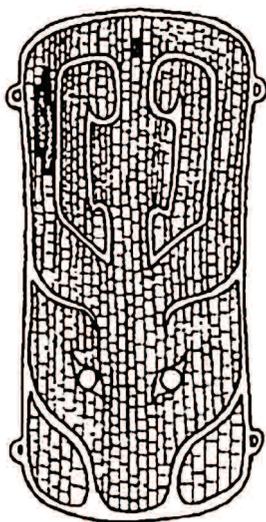
承印商: STIPA

版权所有 - 2020 - Christian Deydier

版权所有人拥有本书所有复制, 翻译与改编之权利。此拥有权涵盖全球所有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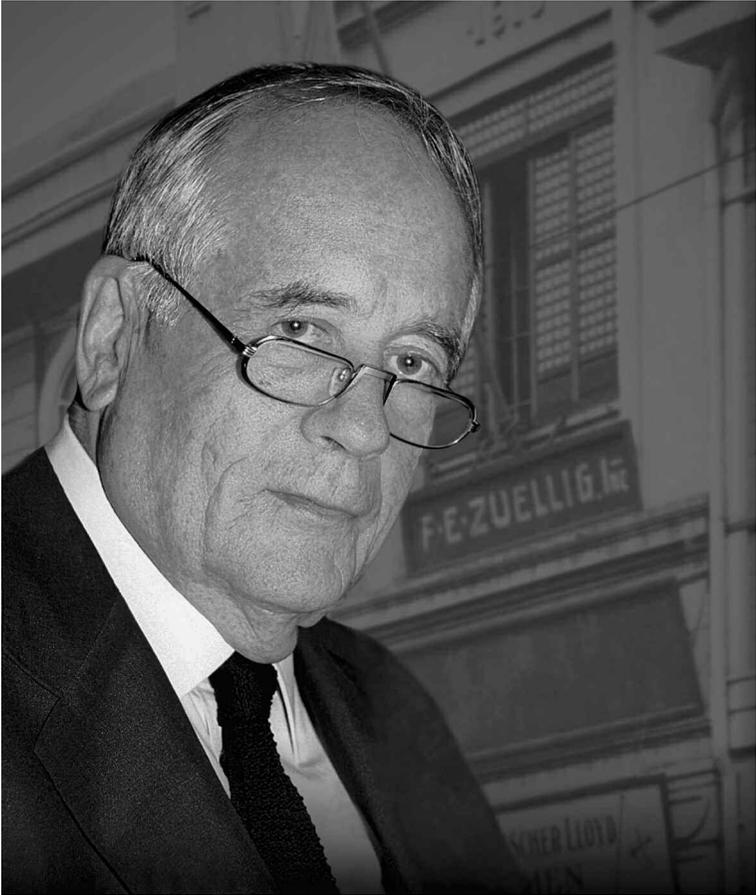
最早期中国青铜器

夏代二里头文化



戴克成着





献给我的挚友史提芬裕利博士 Dr. Stephen Zuellig

序言

时为1992年第十六届巴黎古董珠宝双年展，有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欣然踏进我的展摊。这位绅士胸有成足地走到一尊二里岗时期的鬲前面（二里岗时期为商代初期（公元前17/16至14世纪）的一段时期）二话不说，很坦率的告诉我他立意要买下这件珍贵的器物。他还告诉我他遍访世界无数博物馆，也翻尽无数关于古青铜器书籍，决意收集中国的古青铜器。还郑重地向我表明他已选了我作为他的顾问！

作为他的顾问，我有幸在直至裕利博士今年初去世的25年间辅助裕利博士整合了世界上私人收藏中最重要，最珍贵的中国古青铜器收藏品系列。自一开始以来，博士特别对被视中国最早期商代青铜器之兴趣与投入已为人所共知。这包括了二里岗时代（公元前17/16至14世纪）和更比商早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公元前19世纪至17/16世纪）。

在2017年的七月，裕利博士指示我替他编辑一册有关二里头文化的刊物。这主题除了是他的至爱，也志在帮助一些业余的青铜器收藏家与爱好者能对这类重要性受人忽略，但形制简洁，脱落优雅的夏代珍品有更深入的了解与认识。

此书实为本人秉承博士指示和意愿之下进行的研究结晶。在此我谨把这本书呈献予裕利博士，以表我对博士的情怀与他对我诚意的回忆。也希望通过此书能让新进的收藏家以及普罗大众获得对此类古中国最早期的青铜器有更深入的理解与认识。同时更能欣赏夏代青铜器之精髓。

在此也向诸位给予我尽大支持与协助的朋友致谢：一位能给任何物件赐予生命，活灵活现的天才摄影师 Vincent Girier Dufournier，助我把这本书从法语翻译成英语，并在一些关键地方提供了考究确认的 Ed O'Neill。最后在此向我的助手，由始至终每一阶段都一刻无暇替我把关的 Clémence Artur，致以最高的谢意。

戴克成



夏代的二里头文化

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到今天尚未发现任何夏代时期文字记录的蛛丝马迹。故此现今我们对夏代(公元前21-17世纪)的认识几乎完全局限于那些自夏代远远湮灭后才写成的古代文献记载的资料。以此类文献纪录作为研究主体基础。其中尤为重要的应首数公元前5世纪左丘明编撰的“左传”,公元2世纪司马迁编撰的“史记”,公元3世纪之“竹书纪年”和南宋哲学家朱熹(1130 - 1200年)所写的“通鉴纲目”等。

直至20世纪初期,夏代曾经一直被许多非传统派华人及大多数西方学者视为只是一个神话传说。但到今天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夏代这段历史是真真正正曾经发生过,并就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王朝的真身。

通鉴纲目描述中所谓之夏代历时439年。从公元前2205年至公元前1766年,另按竹书纪年所记,则夏代统治下的中国却只维持了431年,自公元前1989年至公元前1558年。唯时至今天,现代的考古家和科学家大概敲定夏代的统治期间应时自公元前23到公元前17世纪之间。

尽管古代文献都对夏代皇朝是一个统治期为一段由17位相继登基的统治者时期的定论一致赞成,但对个别的统治者确切称号存在了一些分歧;司马迁称他们为'帝',而其他文献中则称他们为'王'。某些现代教授甚至称他们为'侯'。而'侯'这最后一个称号出现于当前某些学者的论述的理据是这些学者认为夏代实际上并非为一个君主制度,而是一个部落或国家的联盟的制度。

大禹

大禹是夏代的第一位君主，也是一手创造夏代的伟大领袖。中国历史里的大禹，被评为一位成就无比辉煌卓越的领袖。无论即使以现代标准衡量，他仍然为历代一直最受中国人民崇敬和景仰的帝君。大禹最备受歌颂的事迹就是战胜驾驭了肆虐大地的水患，再建构了庞大完善的灌溉河道系统网络。从此把过往的沼泽湖泊化为肥沃的农地，使老百姓能从事耕种。让夏代的子民能享受到古代中国人前所未有的繁荣，过着富裕和丰盛的生活。

事实上，大禹一直受到后世几百年继后王朝的崇敬。华夏的西周（公元前1066年至公元前771年）帝王与他们的子民不仅把他神化，还把他尊为驾驭洪水的天上神灵。就如汉代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所说，大禹作为古代首位统治者，他的政策成功地将人民的福祉置于坚实的基础之上。

中国第一件青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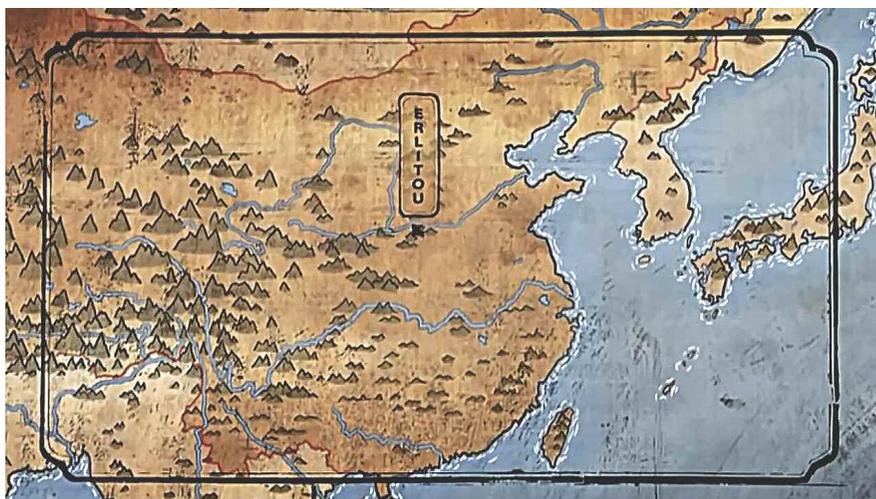
大禹也是中国的文化和科技史上第一位下诏铸造青铜器的帝王。在光复了为患以久之九大片水泊之地后，他把国家的行政划分为九个相应的州份。为此他下令在每个州铸造了一只瑰丽无比的青铜鼎。这些青铜鼎成为大禹及后世统治者绝对统治权力的具体象征。是作为统一夏代的统治者权力的不容置疑的象征。司马迁所记录下之大禹铸造九鼎，亦是中国史上首次纪录生产和使用青铜器的重要文献纪录。

二里头遗址的科学化发掘证实了夏代曾经真正存在。

证明二里头遗址及其与夏代民族的联系。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项从1952 - 1953年一直至到1957年于河南省偃师市附近的二里头遗址发现，发掘和考古的工程计划无可否认的是中国考古学里一个重要里程碑。其中最重要的是首次提供了可信的科学证供与证据，证明了夏代的存在。这个王朝迄今为止只被许多现代学者和历史学家视为神话传说，一个出现于古代经典文献传说中古远的王朝。

1952 - 1953年间，于现时河南登封县玉村发现了现时被称为“二里头文化”的首个发现。也根据当时的发现，考古专家韩维周，丁伯泉，张宝德撰写了题为“河南登峰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之考古报告。并于1954年第6期“文物参考资料”中刊登。



这类器物无论在形制和风格上,与现今所发现的并不类同。不仅与安阳小屯的器物不同,且与郑州二里岗遗址所发现的器物也大相逕庭。随后在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郑州附近的洛达庙,洛阳东干沟,夏县以及邻近山西省西南部地区附近的挖掘工作发现了形制和样式相同的器物。

在所有这些遗址中,河南省偃师二里头的遗址是地域面积最大,层次最深的遗址。所发现的器物既以数量,形制及造型风格都别具一格。为此考古学家决定将他们的新发现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从而区分这些个别遗址的文物和他们过往二里冈和安阳发现的商代文物。受到最初发现的启发和鼓舞再加上根据古书对夏民族的记载,在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旭生带同了大批考古学家在今河南豫西和毗邻的山西省西南部进行更广泛的发掘工作。

他们选择这些地点有合理原因。古书把这些地点准确地记载了。按古书的描述,夏民族栖息之地大概位于山西省的浍水和涑水一带。故此夏族的故乡应就在此地。这个地区在左丘明的左传中称为'夏墟'。同时公元前300年度邑解的逸周书,公元前94年司马迁在史记中周本纪提及过。是位于河南省洛河,伊河之间的地区。

在史记里,司马迁进一步提出夏文化起源于现今河南省东部的黄河流域。司马迁更加引述了周武王(公元前1066 - 1063年在位)的话,说道“伊,洛河之间是为夏民族发源地”。

1959年徐旭生领导的考古队最重要的成果是在今河南省洛阳附近的偃师发现了中国最早期的大型宫殿遗址-推断古至二里头时期晚期。之后上述遗址中在1960年至1964年,1972年,1973,1975之后从1980年开始,每年间都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掘。

至此,考古学家们现在对二里头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已有了比较准确和深入的了解。现在大多数学者都公认二里头文化是中国第一个朝代,亦即夏代的文化。

迄今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覆盖宽1.5公里,总2.5公里,发掘出土的包括了下列的文物:

甲。下列各类型的建筑遗址;

- 巨大房屋的基础地基,更贴切应称为“宫殿”。现在遗留只有大型矩形的夯土地台。
- 较小型房屋的或普通住宅的基础地基,其中部分为地下室。
- 粮仓炕
- 陶窑遗址
- 绿松石头加工工作坊遗迹
- 铺上砾石或夯土的道路遗址
- 水井
- 不同形状和用途,用以葬人之坟墓

大殿

在二里头遗址进行的科学发掘揭露了矩形的夯土地地基都座向南北。这些宏伟的建筑物与宫殿看来皆只用木头构建作基础,这在古代的建筑技术较为常见。



第四号宫殿

第一座宫殿的遗址在1960年被发现。这座建筑的地基几乎是正方形。宽达108米,长100米,地基深度都在1米到2米之间。由每层厚度为4.5厘米的地层组成。这些地基对比周围土壤地乎几乎高出了80厘米。其他的文物显示这座宫殿曾被一座高约45至60厘米的土质围墙所包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系列的洞穴与平台边缘平行并列,估计最有可能是为了嵌入支撑一条长长的有盖走廊的木柱而挖,这走廊大门口朝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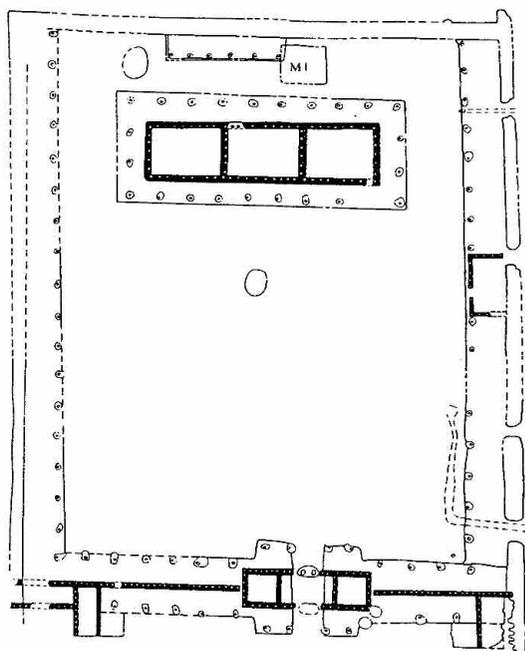


第四号宫殿

右页: 图示二至五号宫殿地基



同年后期发掘出第二座建筑物的基础,称为2号宫殿。第2号位于第一“宫殿”遗址东北约150米处。比第一座'宫殿'保存更良好和更小。这遗址包括一个方形平台,每边大约33米。在对该遗址进行仔细研究后,考古学家在宫殿中央北部的一座走廊中终于成功重组出一幅实在,兼可信性高的原始宫殿面貌。该宫殿由三部分组成,三部分都以外部阳台的形式延伸出原始建筑的外部。同样地,建筑物南端的双走廊也从朝南的大门延伸出一个阳台。在原本建筑物的中央部分,发现了一组由赤土陶管管道组成的排水系统。



二号宫殿图

自1999年以来,发掘主要围绕早期发现建筑物和房屋地基与街道等遗址的范围。最后考古学家们发现了颇多其他的类似基础。

楼房

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大量一般楼房的遗迹。尽管大小各不相同,某些相当长并且包含多个房间,但都是坐落在矩形地基上。考古学家认为这些规模的差异表明夏族社会中存在阶级制度甚至存在了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的社会秩序的威权势力。而此势力应该同时在推动和执行这种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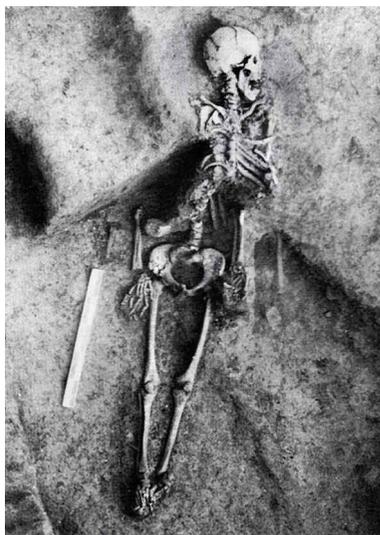
2002 VF75号楼房地基

陵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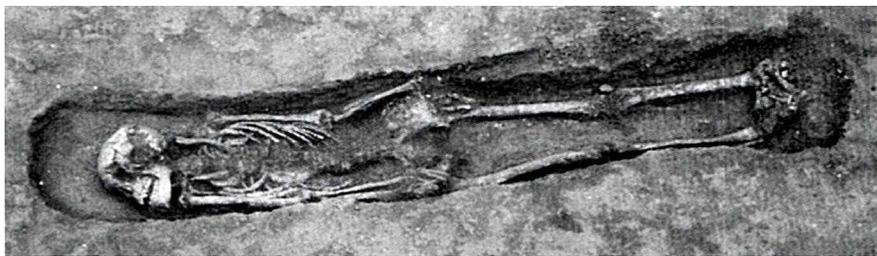
考古学家在现场挖出了几种不同的陵墓。有些长方形,而另一些则是圆形。此外,这些坟墓的深度各不相同,其中的骸骨或部分物品显示埋葬在坟墓的尸体经许多不同的方式埋葬并被置于不同的位置。某些坟墓的情况强烈显示了死者为暴力致死。一些骷髅头骨清楚表明被斩首,身首异处。有些情况表明死者被活埋。夏民族社会重要成员的豪华坟墓,埋藏了无数的陪葬主要如漆器棺材,硃砂碎片,玉器和骨头等。有时也会挖出一件,甚至有时会有几件青铜器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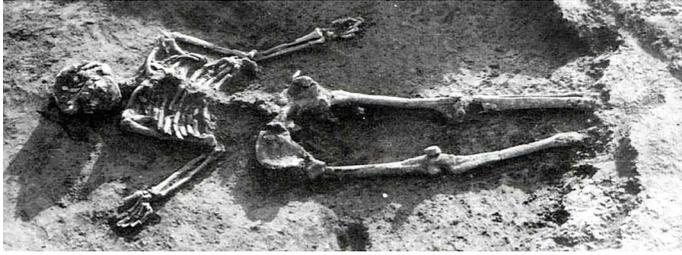
IV M19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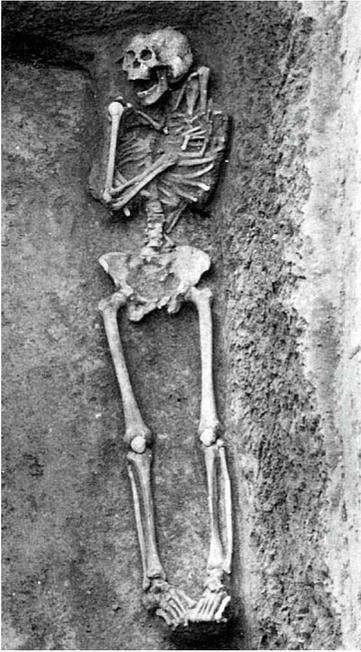
V M208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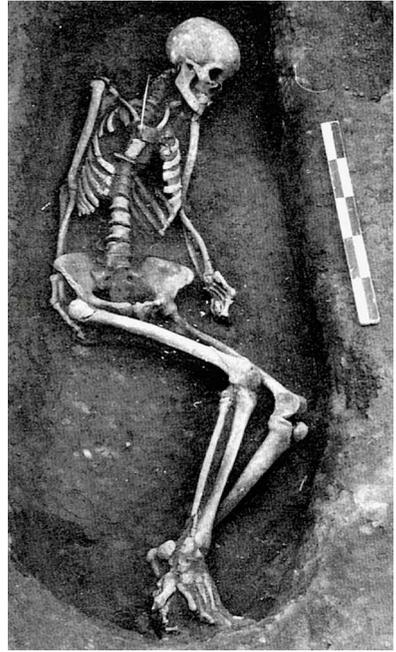
V M57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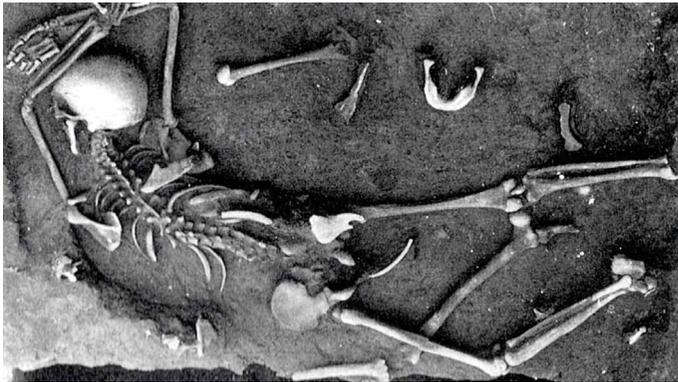
V M60号墓



V M61号墓



V M56号墓



V M204号墓

二里头,遗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以及对该地区的定期考古考察不仅让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迄今为止半神话般的夏族民族有了更透彻,更实际的了解,也带来了中国史上第一批生产青铜器的成果。大多数现代专家把这些器物归类为夏代(公元前21 - 17/16世纪)的青铜器。

发现第一批青铜器

1972年10月至1973年在该地进行的挖掘工作揭开了宫殿的基础的神秘面纱,也挖出了一些古物。其中包括矛尖,刀,鱼钩,戈和戟等。但最重要的发现是一只礼仪用的铜爵。此尊爵 (VIII T22 3:6) 为中国史上第一尊经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早期青铜器物。它高12



爵 VIII T 22 3:6

厘米,壁厚特薄,厚度仅0.1厘米。成分为92%铜和7%的锡的合金铸造而成。发掘出来的其中一些工具材料成分是由98%的铜和1%的锡组成的合金铸造。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金属器物都是从现场的第三层土壤层中出土。

1975年秋季中进行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三座墓 (75 YLVIK M3:5),这三座墓都可以追溯到二里头三期。墓中陪葬品包括玉器,骨器,铜器与陶器。

该群墓中最大为k3号墓 (K3),也最令人产生兴趣,原因是它包含了一条2.3米×1.26米的大型矩形沟。深度1米至1.26米,与另一条较小的沟1.7米×0.74米接壤,深度在1.38至1.44米。较大的沟埋有青铜器,陶器和绿松石。较小的相邻沟渠则埋有玉器,青铜器和容器,几件骨头做的文物,贝壳和绿松石。



1975年考古队最重要的发现是两个青铜的三足爵杯。其中一个状态相当良好,另一个化为碎片。较好的三足爵总高13.5厘米,体壁厚1毫米,三根足高5厘米,流长度5.7厘米。器物提梁较宽,有三处穿孔。



照片:爵 III M2:2 1980年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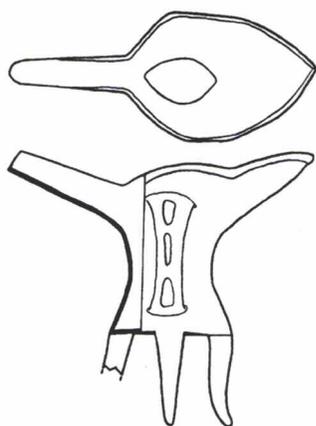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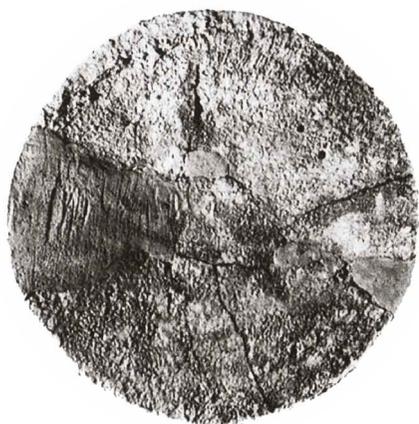
插图:爵 YLVIK M3:4形制

在K3墓中发现其他青铜器物有两个直径11.6厘米,厚0.1厘米的圆形扁平形状的器物。其中一个饰面开有三个孔,另一个饰面有残余木质和绿松石的痕迹。正如一些考古学家所言,这些薄而圆的器物很可能是铜镜的雏形。铜镜后来在中国尤其战国时代(公元前475 - 221年),秦代(公元前221 - 206年),汉(公元前206年 - 公元220年)及其后的中国历史里都大受欢迎。

1980年秋季进行的发掘行动集中在二里头遗址的第三区。这次行动所取得主要成就是从二里头第三期三号墓 M2:2 的发掘得到的成果。虽然墓址相当小,长度只有2.55米,宽度1.20米,但墓地 III M2:2 却提供了丰富的开采成果,尤其是出土的青铜器。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两把青铜刀锋，一把长18.4厘米，另一把26.2厘米。尚有两件礼乐青铜器，为两只三足爵。其一高18.4厘米，另一高22.4厘米，造型优美。两只中间部分都呈饱满，较短，上部主体细长，凹进。其上部主体的一侧附有长而宽的穿孔手柄，狭长的流从顶部口缘延伸。三根呈往外弯的锥形足从中间部分伸出。

下一个考察团的发掘从1980年冬季一直持续到1981年的春天，大家也将重点集中到第三期的区域。这次考古学家从二里头第二、三和四期遗址发现了大量陶器，但完全没有青铜器出土。



青铜镜早期雏形？ VI KM4:27



青铜镜早期雏形？ VI KM3:9

继续下来发掘于1981年下半年重开。范围集中于V区，这次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第二期(M4和M5墓)，第三期(陵墓M1和M3)以及第四期(M6号墓)的一系列陵墓。其中第二期的古墓M4出土的几件器物，大大增加了我们对夏代的认识和了解。其中有一个8.5厘米高的青铜铃(81 YLV M4:8)和一个绿松石镶嵌的青铜牌饰，牌饰形制略带拱形镶嵌有绿松石(81 YLV M4:5)长14.2厘米。当从上俯瞰时，绿松石和将青绿色的碎片经青铜细丝分割成若干部分，形成饕餮图案。

饕餮拥有又大又圆，凸出的眼睛和头上高高的向内卷曲的角。在发现此牌饰之前，类似器物只见于西方私人收藏品中。但碍于无知和缺乏考据，这些器物错误地被视作较晚期的文物。



81 YLV M4:5号牌饰



M11:7号牌饰



罍 M9:1

在M4号墓中出土的青铜铃和绿松石镶嵌牌饰,为中国青铜器铸造的演变及进化提供了迄今为止那“缺失的环节”。并让考古学家清楚了解晚期中国青铜器中饗饗面具雏形的来源。

1984年秋季考古工作集中发掘二里头第三期的一些墓址。从M6, M9和M11中发现了几个重要陪葬品:

- 爵1984 4L V1 M6: 5
- 罍1984 4L V1 M9: 1
- 铜牌1984 4L VI M11: 7
- 小青铜铃1984 4L VI M11: 2



鈴 M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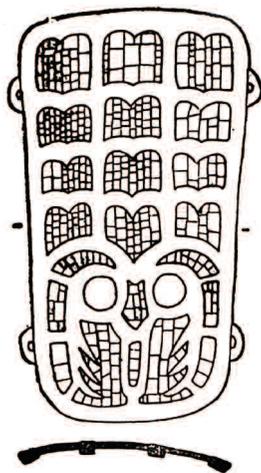


爵 M6:5

• 在M6号墓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件陶制的盃,同时发现了一只青铜爵。

• M9号墓挖出两件陶盃,一只青铜爵(M9:2)和一个青铜制的罍(M9:1)。这是该地经科学化发掘中出土的第一件可以推论为二里头文化的文物出土青铜器物。

• M11墓提供了最丰富和最多规格标准的文物。其中包含了陶造的盃,一只青铜爵(M11:1),青铜铃(M11:2)以及饰有绿松石饕餮图案的青铜铜牌饰(M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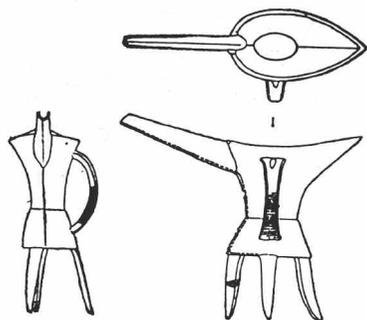


铜牌 M57:4描绘图



铃 M57:3

在1986年秋至1987年春季,进行了对几个二里头文化二,三,四期墓址的发掘工作。收获最丰富的是M57号墓。追溯到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时代。其中包括8件玉器,9件陶器,其中一件是盃。还有4件青铜器。其中一件是爵(M57:1)高16.4厘米,小铜铃(M57:3)高8.45厘米,镶坎绿松石的青铜牌饰(M57:4),长15.9厘米,还有一把青铜刀(M57:2)34厘米长。



描绘图:爵 M5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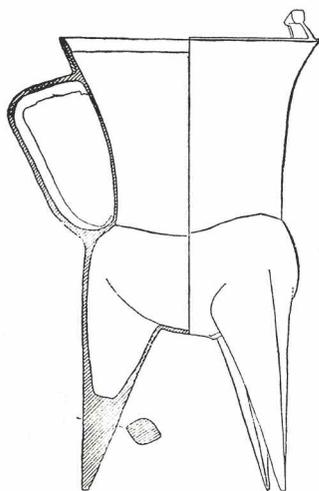


爵 M57:1

右页: M57:4号牌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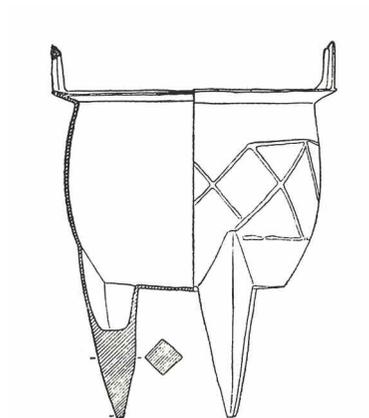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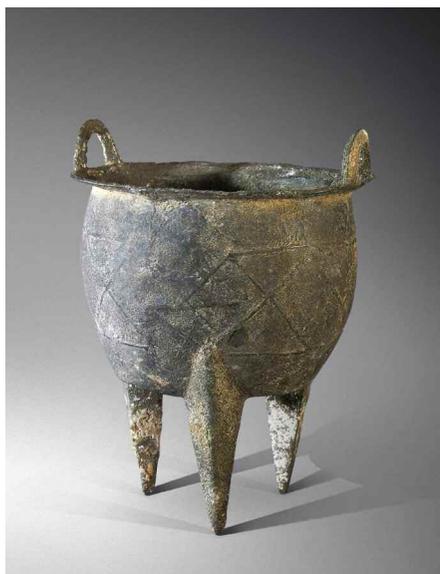
在1987年春季的挖掘工作中,从墓87 YLV M1发现的陪葬品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大的线索和启发。陵墓属于二里头四期。出现了两件重要礼乐青铜器,一只是罍,另一只鼎。两者形制和构造都为考古学家迄今前所未见。尤其是鼎,应是早期有系统的发掘首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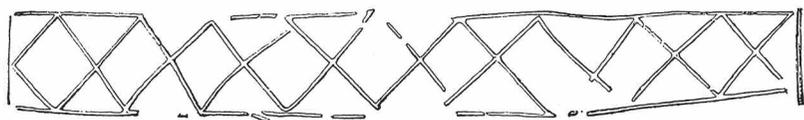
罍 87 YLV M1:2附草图。

- 此高26.8厘米的罍 (87 YLV M1:2) 无论形制和构造与1984年同一地点发现的罍大不相同。1987年的罍凸底及三足皆中空。圆形的三角形。非常类似于礼乐器物鬲 (参见第?页)。故此它可被视及后所有二里岗时期 (公元前17/16 - 14世纪) 青铜器形制的鼻祖。

- 鼎 (87 YLV M1:1)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第一件此类形制之器物。它高25厘米, 呈深圆形, 薄壁碗状, 附有两个弧形手柄。其上缘两侧各一手柄, 平底, 附以三根中空, 圆润, 三角形尖状足。器物表面饰有一系列轻微拱起的三角形网状纹饰。



鼎 87 YLV M1:1附草图, 浮雕覆盖躯体中部。



从1988年开始, 在此处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研究宫殿遗址的基础地基, 四周墙壁, 道路, 疑似运河系统和其他可能帮助考古学家更了解这座城市的基本布局和演变的元素。很可能此处为夏代首都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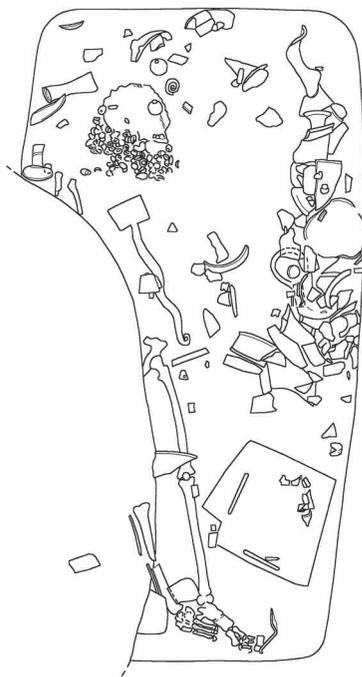
中国最早的龙

2002年春，在二里头遗址的02VM3挖掘工作时，出现了中国考古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出土了一条由2000多块绿松石组成的长龙，纵向放置在墓主人骸骨的肩膀和腰围之间。墓主人很可能是当时夏代社会贵族。这位30-35岁的男性墓主人是按当时的葬俗作纵向安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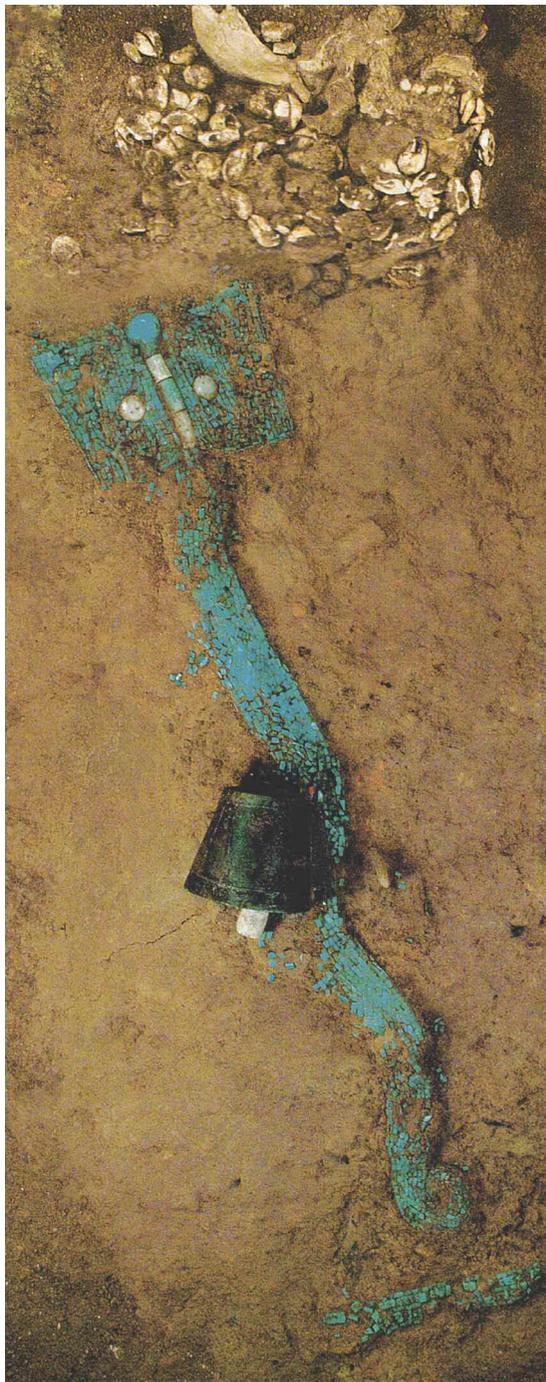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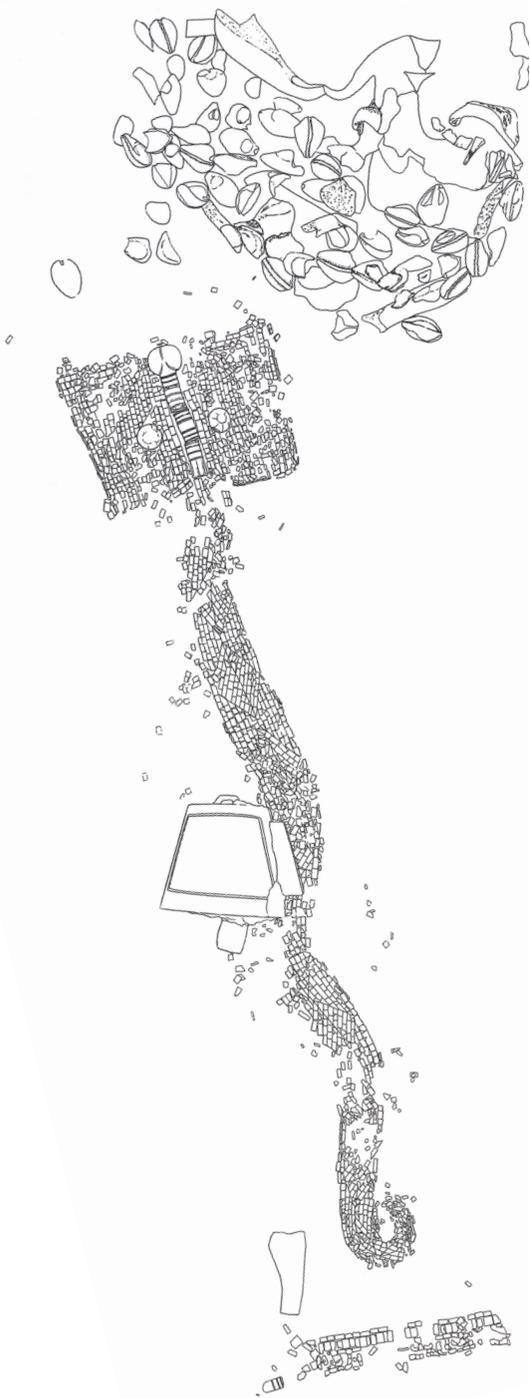
当今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自夏至今龙的重要性有许多流行的理论。一些人相信二里头遗址陵墓02VM3中绿松石龙的发现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相信夏人崇拜龙。在看到突然的闪电，长长起伏闪电像龙一般，穿透了暗黑的夜空。随着而来的是生命的降雨，代表生命的开始。龙就是天体神灵真身的现身，被视为夏人的保护神和恩人。

此龙上的绿松石最初附着于现在已经完全瓦解了的饰牌上，并各有个别不同的形状和尺寸。长度在0.2厘米至0.9厘米之间。平均厚度为0.1厘米。这条64.5厘米长的龙显示了一个起伏的躯体。头部是一个15.6厘米长的大矩形头，宽度11到13.6厘米不等。龙头上镶嵌着两颗又大又圆的眼睛，以白玉嵌镶。一个长长的鼻子由三块狭长的白玉饰牌组成。顶部饰上一块大圆形绿松石雕塑。

这条美艳而且工艺无与伦比的巨龙为考古学者提供了对夏人文化意义的实质证据。为到此为止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商代之间提供了那“缺失的环节”。



02VM3号墓草图



02VM3号墓详细图

二里头文化的遗址

现在被称为“二里头文化”的单一文化实体,由近500个考古遗址组成。它们分布在黄河流域及其支流的若干地区,邻近现代的省市包括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位于伊和洛河之间的(伊,洛二水之间)靠近现时的郑州以及山西省西南部,湖北省北部以及甘肃省。

虽然二里头偃师遗址是迄今所有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最重要的遗址,另有两处遗址也特别值得一提。主要因为这两处可能是夏代都城遗址。

- 河南省登封附近的王城岗遗址,发掘出一座土城墙的遗迹。
- 东下冯遗址,位处夏县,是山西省最大,最丰富二里头文物的文化遗址。在此处出土了一座古城遗址,周围环绕着由压缩土建造的城墙遗迹。经碳14化验,验明大概历史从公元前3世纪末开始到公元前2000年早期。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各个时期

考古学家按现场的土壤层和每个地层所出土的文物,将二里头遗址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

上两层被分类为属于二里头文化原始阶段,特点是出现大量附浅浮雕装饰的灰陶器物。

此类文物在河南省汝州临汝镇的煤山遗址以及偃师二里头遗址都有发现。从这两处遗址出土的文物看来,很明显地此两地的二里头文化早期陶器被受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强烈影响。

第一期

这段期间的二里头已成为一个占地约100公顷(247英亩)的地区权力中心。属于这一时期的地层挖掘出的陶器基本上都是灰色或黑色,其中一些有经抛光的痕迹。基本的形制都是盘,甑,罐或三足盘等。这些器物都有绳纹饰,有时还带有按压纹饰。

在河南省浙川下王岗的同期土壤层中也发现了青铜残渣和碎片。

第一期土壤层经碳14化验,估计约为公元前1900年。

第二期

显示了二里头,城市化时期.当时城区总面积扩大到约300公顷(约741英亩)。地层挖出的建筑物遗址发掘出一个面积为12公顷(面积29.65英亩)的“宫殿”,四面由道路围绕。

考古学家注意到这个地层中发现的灰陶比例有所增加,同时经抛光黑陶器也相应减少。器物躯体也变得不那么大,更扁向垂直圆柱形。颈部口缘向内翻,底部肥大。有流的灰陶盃开始在这土壤层中出现。

1981年发掘的二里头遗址,被专家们认定为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位处第5区的M4墓中发现了一个小型铜铃(81 YLV M4: 8),一个镶嵌有绿松石的青铜牌饰(81 YLV M4: 5),青铜牌带有饕餮面纹饰。令在场参与现场工作的专家们相当兴奋。

二里头文化遗址的第三, 四期

二里头文化晚期两段期间与其早期阶段最大的差异是文物的显著增加, 其中包括:

- 石围雕;
- 骨器物, 包括发簪和一件带有纹饰, 长而扁平的器物;
- 漆板, 即使已经朽烂, 尚存部分仍然现出涂漆和红漆的痕迹;
- 玉器, 无数玉器件, 经过颇精工的抛光, 证明了制作技巧已经相当完善和成熟。在这些玉器件中, 有不少纹有动物面具浮雕的扶手, 以及一些刀刃和璋;
- 青铜器, 从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演变的角度来看, 最重要的发现是在第三期和第四期出土文物发现了众多青铜器器物, 包括了刀刃, 剪刀, 凿子, 矛尖等。特别是第一批科学挖掘出土的中国古代礼乐器: 爵, 斝, 鼎和带流的盃。所有这些器物证明中国已经在二里头文化晚期进入了青铜器时代。

第三期

第三期是指二里头村人口达到18,000至30,000人口的时期。标志着这种文化演变的一个重要拐点。当时宫殿已拥有一座高2米的土墙作为保护墙。也造出了各种新品种陶器。更最主要的是开始了正规以及有计的青铜器的制作。

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并迅速普及新形制的陶器有鬲, 罍, 樽, 簋, 瓮, 鼎, 豆, 甗等。

人们通常在器物上加以简单的装饰, 例如纹上梳子状或绳状纹饰。器物的原材料从早期的偏黑锐化为灰色。

青铜器在同一时间开始面世。但据马承源教授重申强调, 这些最早期的青铜器所显示的精细度让人怀疑如何能于未经长时间准备和未有反覆从错误中学习测试的情况下可以突飞猛进。因此大家尚对中国青铜器生产史的一些空白和遗漏, 期盼考古学者的新发现能填补这些空白。

到目前为止, 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许多遗留青铜器物, 模具碎片和一些小型的青铜器件如青铜刀, 凿子, 剪刀, 箭头, 长矛和小铃等。

第四期

然而在期间仍挖出更新型的陶瓷器物。它们的出现逐渐取代了二里头文化的第一和第二期中最常见的形制。造型更开始近似后期二里岗文化中的陶瓷器物的形制 (大约公元前17/16 - 14世纪)。至此我们开始进入商代 (大约公元前17/16 - 12/11世纪) 承传夏代的的新纪元 (大约21日至17日) / 公元前16世纪)。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间三足高等器物产量更大, 形制也更加标准化。

虽然数量尚还不少陶器, 但青铜爵, 罍, 鼎和盃等器物比第三期时更为普遍。

专家对其中一从4期土壤层挖出器物ZK286进行了碳14测试, 测出为第4期时间为公元前1625 ±130年的物品。

有关二里头的争议

尽管许多或甚至大多数中国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属于夏代,但仍有很多考古学家质疑这种推断。

由于缺乏当时的文献记录或实质和具体证据证明二里头遗址的所在地实际上就是夏人民栖息聚居的实在位置,故此争议仍然存在。也许解决这个争议的唯一合理方法是对现存古代文献中的资料与二里头遗址的实际位置进行更深入比较和印证。探讨它们如何匹配,才再尝试解释二里头的文化层去研究这些遗址之间是否存在早期文化层(从第一期和第二期)到晚期(所谓第三期和第四期)之间的断层或不连贯性。

现实存在了三种主要的理论,各自表述,争取认受。

理论一:

二里头文化等于夏文化。

一批考古学家将整个二里头文化明确和毫无保留地归属于夏人。他们把这四个文化层之间出现之断层或不连贯性解释为是商人的入侵占据所致,或推论夏人迁都该地而致有这差异。

理论二:

二里头遗址的早期土壤层属于夏代,后期土壤层属商代初期。

对于那些坚持这一理论的人来说,现场的地层的不连贯性被解释为王朝中断。而夏文化最繁荣的晚期刚正受新势力冒升的商代所影响。

理论三：

龙山文化的结束和豫西二里头文化的开始与夏代相应，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末期与二里岗时期的开始直接相关。相等于商代的开端。

尽管上述理论都存在差异，但起码在有关二里头的早期阶段这议题（即第一期和第二期）大家似乎已达成共识。所有人同意属于夏代时期。

考虑的重点：

尽管缺乏与夏代实际相符的当代文献记录，但考古学家们确实有几个不争的事实支持他们论调。

二里头文化所延申的时期有异于处于他们东方龙山文化的时期。尽管二里头文化比龙山文化进化程度更成熟，二里头文化却源于龙山文化。同时与后期之齐家文化相承，有重要的联系。

从那众多二里头文化发掘遗址与提及有关夏人的古文献中，传统的分布显然不谋而合。尽管推论将二里头遗址四期定在夏或商两代，但从碳¹⁴测试结果中获得的信息中我们获得了一个更精确的遗址，以及当时文化繁盛的断代。

碳¹⁴测试表明二里头遗址的四个时期持续了约500年。从第一期的1920 B.C. ±140年 / 1900 B.C. ±130年开始，持续到第四期的1625 B.C. ±130年（器物样本ZK286）。

放射性碳测试从郑州商文化遗址和二里岗那边也产生了一些有趣的结果：

- 郑州 (取自围墙样本CET7): 1620 B.C. \pm 140年
- 二里岗 (第三土壤层, 样本 ZK717) 1595 B.C. \pm 140年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洛达庙和南关外的郑州商城遗址处在二里岗文化地层下, 挖出二里头文化层。

这就是说, 通过放射性碳测试获得的结果显示, 所测试的样品是早于商代二里岗时期, 并且毫无疑问地与夏代的时期符合。

综上所述, 放射性碳测试结果证明二里头文化先于二里岗, 二里头遗址的四个时期完全符合夏代时期的推断范围。





中国青铜铸造的起源

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献与传说将中国青铜器铸造的起源归功于夏代创始人大禹。他被誉为铸造了九尊青铜鼎作为他的超凡力量的象征,分发到夏地的九州。

过去100多年的考古发现中,尽管尚未发现大禹原来的九鼎,但过程却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冶炼金属合金的演变与发展有了相当清晰的了解。二里头/夏代二里头时期的第一批礼乐青铜器出土,更加强专家的信心与认识。尽管仍然存在一些缺失的环节,我们现在对演变过程可以作出如下的总结:

- 仰韶文化 (大约公元前5000 - 3000年), 出现在位于现今甘肃省到河南省与甘肃省之间的地区。其中心为从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延伸至豫西晋南地区陕西省宝鸡市,即现代陕西省宝鸡市。

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的仰韶半坡文化遗址 (大约公元前4800 - 4300年), 在临潼姜寨发现一个小黄铜颗粒和一个管状黄铜器物。陕西渭南北刘仰韶半坡文化遗址发现的黄铜发夹都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姜寨发现的一个盘,也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五千年。这个盘的成分由65%的铜和25%的锌合金构成。

- 龙山文化 (大约公元前2500 - 1900年), 位于现今山东, 河南, 陕西, 河北, 辽东, 江苏省等地区。

自1955年起, 从当地河北省唐山市大成山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几件金属文物为铜合金混合物制成。山东省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小器物, 推断源于公元前3000年至2200年。由铜和锌的合金制作。

- 马家窑 (约公元前3800 - 2050年) 位于现今甘肃省西部, 青海省东部和四川北部的川北部。

甘肃东乡林家出土了一把小青铜刀, 古至公元前3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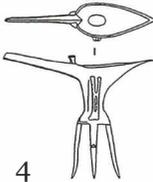
- 齐家文化 (约公元前2050 - 1700年), 位于今天甘肃省青海东部和宁夏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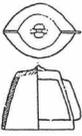
由于齐家文化的历史远至“青铜器时代”, 因此在这个时期的遗址中发现的大量青铜做的工具, 武器 (斧头和刀具) 位于今河南省豫西部和山西省南部。

- 二里头文化 (大约十九世纪至十七世纪至十六世纪) 位于今河南省豫西部和山西省南部。

专家们在二里头遗址第一期地层发现了青铜器碎片, 但迄今并无发掘出二里头文化的第三期前的青铜器碎片。



	爵		角盃	罍	
二里头 土层 2					
二里头 土层 3	1 				
	2 	5 			
二里头 土层 4	3 		7 		
	4 	6 	8 	9 	10 

盃	鼎	铃			牌饰
		 <p>13</p>	 <p>15</p>		 <p>18</p>
				 <p>17</p>	
 <p>11</p>	 <p>12</p>	 <p>14</p>	 <p>16</p>		 <p>19</p>

N° 1 : 1973 YLVIII22 3:6

N° 2 : 1980 YLIIM2:1

N° 3 : 1984 YLVIM6:5

N° 4 : 1975 YLVIIKM7:1

N° 5 : 1980 YLIIM2:2

N° 6 : 天津博物馆

N° 7 : 陕西历史博物馆

N° 8 : 上海博物馆

N° 9 : 1987 YLVM1:2

N° 10 : 1984 YLVIM9:2

N° 11 : 1986 YLIIM11:1

N° 12 : 1987 YLVM1:1

N° 13 : 1982 YLIXM4:1

N° 14 : 1984 YLVIM11:2

N° 15 : 1981 YLVM4:8

N° 16 : 1987 YLVIM57:3

N° 17 : 1982 YLVM22:11

N° 18 : 1981 YLVM4:5

N° 19 : 1987 YLVIM57:4



爵 玫茵堂珍藏

夏代青铜器

虽然大家对于中国青铜铸造的起源还有不尽知之处,但二里头文化初期的青铜废料和青铜器物碎片已在各遗址如河南淅川下王岗等纷纷出土。正如前述早期二里头二期的小青铜铃和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等就已存在。唯青铜礼乐器却到二里头三期才开始出现。大家想当然的猜测早期的铸造技术应该相当原始,但事实上技术相当先进成熟。我们从二里头三期的实物证明了当时工匠具备精湛技术,能生产高质量,繁复的青铜器。而器物的美态与造型更加应归功于他们已拥有多模铸造方面的高超技术。遗留下这些巧夺天工的杰作以供后世欣赏赞叹。

按我们之前已知的部分再加上考古学家科学发掘的文物看起来,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皿是商代青铜器的祖先。它们在文化和历史上显然是有联系的。故此我们可以安心地告诉大家它们是夏代后期的产品。夏代的青铜礼器只有四个类型。即爵,大罍,鼎和盃。除此以外,也有镶嵌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小铜铃和青铜的兵器和工具等。

爵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1972 - 1973年二里头遗址上出土的第一个盛酒的古铜爵是该遗址发现中最重要的文物。它提供了实质的证据,证明比我们想象中更早的时期在中国大家已经在制造复杂的青铜器皿。

二里头遗址直到现在出土的十几件铜爵中,只有一件有纹饰。在1975年夏天出土时,它的手柄另一面装饰着圆形凸起的饰带,上面有一道浅浅的浮雕。图案通过在模具内部蚀刻而成,引证了早期的铸造技术已经非常先进。

夏代最古老的礼乐青铜爵形制主要为薄壁(1厘米厚),三足,口缘一边附有一根直,长,像水沟的流。流附着口缘壁边的接合处每边有一鼓起蘑菇状装饰覆盖。器物的躯体往上伸展渐呈收窄,底部如鸡蛋圆润球根状。往上至口缘时扩阔。整件器物由三根三角形的尖足支撑。器物一边附有半弧形手柄。

随着二里头演变的各个时期,爵的形制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变化,可以概括如下:

- 二里头遗址第三期三第层出土的爵较小型,呈蹲下型态;三角足很小,而且流口很短。



爵 玫茵堂珍藏



- 在二三期末至二里头四期开始的期间,爵的流变得更大,与其余部分看起来有点不相称。这类爵的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例子是在玫茵堂藏品(见图)。爵形制整体下蹲的姿势。瘦身和修长的流造出整体优雅,脱俗的效果。再次见证了夏代青铜铸匠的杰出技艺。
- 到了二里头第四期,大型礼乐青铜爵首次亮相。此尊爵特点在于有一只非常长窄的流和三根更长和更壮的三角足。这些巨型和流口特长的爵尤为特别罕见。1980年首次在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名为“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的中国青铜器大型展览。(参见展附录第79页第一项);另一尊类似的大型爵曾于2013年在巴黎吉美博物馆展出,现已成为玫茵堂藏品。此大型爵也出现于戴克成先生(Deydier Ch.) 2016年巴黎出版的 *Initiation aux Bronzes archaïques chinois* (中国古青铜器入门) 第69页中。

要铸造出这种青铜爵,极有可能需要四套模具。制作过程中使用的合金由92%铜和7%锡等混合而成。



罍

到目前为止,在二里头遗址至少有六件夏代的青铜罍出土。

其中最古老也是第一只被发现的年代久远至二里头第三期。是在1984年挖掘M9墓的过程中发现。高30.5厘米,这罍具有薄壁,中心收窄,一边有一根半弧形的垂直手柄和上缘两个物盖上小蘑菇饰帽的特色。

另一个罍是1987年从87 YLV M1号墓发掘出来。断代为二里头第四期初。形制上它与上海博物馆,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品的罍或戴克成 Deydier Ch. 在1991年11月发行的 *Oriental Art* 杂志封底所展示的非常类同。即如其他罍一样,87 YLV M1号墓中发现的罍有一个圆形鼓起的下半身,上部较窄,呈直线。修到接近顶部口缘部位时逐渐向外翻。形体由三根空心的锥形足托起,足形与鬲非常相近。

玫茵堂藏品中二里头时期的罍与二里头遗址发现非常相似。但形制多出一个附加元素特征。其为器物中间位置附近的装饰两条水平浅浮雕带状纹饰,包围着一组几乎不能察觉的小圆圈。



罍 玫茵堂珍藏

鼎

截至目前为止,从二里头遗址只发掘出一只铜鼎。1987年在二里头发掘工作过程于第四期区域发现上述第二只斝的同时,在87 YLV M1号墓中发现了一只鼎。鼎高20厘米,手柄直径15.3厘米,形体是平底圆形盆状,薄壁。由三根器物附于下半部中空的三角锥形足支撑。两侧两根半弧形的拱形把手从顶部口缘互相呼应。器物的形体上部由一根以纵横交错的线条浅浮雕饰带装饰。



鼎 87 YLV M1

盃

一座高24.5厘米的青铜器在1987年自二里头遗址一号墓二区出土。属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陵墓。此青铜器在形态上与同一时期的陶制盃相似。它的形状如一个圆润薄壁球状体，一侧是一个倾斜的开口，另一侧是一个向上凸起的流口。一条长长的半弧形把手从形体侧面中心顶部口缘伸展直至连结下方其中一根三角足的中心。



盃 87 YLII M1

角盃混合物

即使二里头的遗址尚未出现这种青铜器,但当地发现了少量的角盃混合物。它们基本上像后期的盛酒器‘角’的形制一样,但在侧边中间突出那长长的流却形似早期的盃。形制上几乎相同的陶器在1965年左右的二里头遗址有出土,现在藏于河南省洛阳博物馆。

中国的博物馆收藏了两件青铜角盃混合物,另外一件则为玫茵堂藏品。

第一个青铜角盃混合物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虽然器物的足已经失踪,但这青铜角盃混合物不寻常之处在于它的形体下半部装饰着一个大型的镂空圆圈,圆圈周边上下由一条浅浮雕饰带装饰,中间部分也饰有两条用小螺柱状突起装饰的浅浮雕带。

1980年在河南省洛宁出土了第二只光身无装饰的角盃混合物现保存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第三件已知的角盃混合物是玫茵堂的藏品。戴克成 Deydier Ch. 于2016年在巴黎出版的“Initiation aux Bronzes archaïques chinois”(中国古青铜器入门)第111页和112页中作了介绍。该器物的主体壁薄(1mm厚)底部圆形并往内修。从底部往上延伸渐修窄至颈部下方,后方随着朝上敞开的口缘翻开,颈部逐渐变宽。

形状非常长,稍微弯曲并逐渐收窄的流朝尖端的中点正下方延伸。在器物一个平坦侧面上,一根长半弧形手柄从口缘正下方伸展往下到底座上方。整件器物由三根纤细优雅的三角足支撑,慢慢修窄到尽头化为尖端。



角盃混合型器物 玫茵堂珍藏





铃

这些小铜铃与武器和工具，是二里头遗址发掘到最早的青铜器之一。这些形制像颠倒了茶杯的铃体积很小，从7到8厘米高，其一端有小手柄。

在二里头遗址第二层土壤层 (1981年, M4号墓, 青铜8号), 第三层 (1984年秋, 2号墓, 2号) 和第四层 (1986 - 1987, 古墓M57, 3号)各处都出土了不少数量的铜铃。



铃

武器和工具

发掘工作发现了大批的青铜武器和工具，包括了戟，戈，斧，箭头，凿子，锯，剪刀，鱼钩以及刀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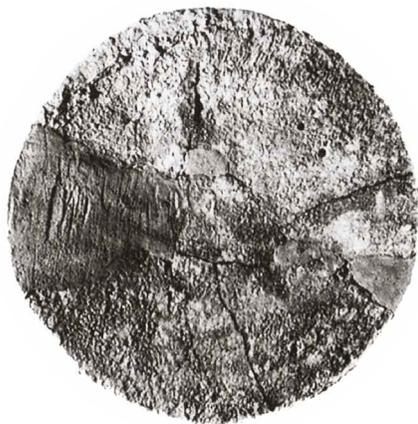
科学化验发现这些器物大多数是由双铸模铸造而成。金属成分为92%至98%的铜合金与1%至7%的锡混合而成。

大部分的青铜武器都是戟和戈。一些戟的手柄纹饰有云或抽象动物图案。有些可能最初镶嵌着绿松石。从上面出现了的凹槽看来，应该曾经嵌上绿松石。

铜镜

1975年秋季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了两个直径11.6厘米，厚0.1厘米的扁圆形器物。其中一个表面饰有三个孔，另一个表面则有嵌过绿松石的痕迹。

这两个器物的形制令人联想到在中国后期大受欢迎的铜镜，估计大概是铜镜最早的祖先或雏形。



早期青铜镜的远祖
VI KM4:27

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

像铜铃一样，青铜绿松石镶嵌的牌饰是二里头遗址中最古老的出土青铜器之一。1981年，M4墓（第5号）出土的这一块牌饰可追塑到二里头第二期的年代。随后在1984年（M11号墓地，第7号器物，第3号土壤层，1986 - 1987年（M57第4号器物，第3号土壤层））发掘了其他类似的牌匾。在进行这些发掘之前，类似的牌饰已经在中国以外的各种收藏中得以保存。

包括了(D. Singer)辛格博士(美国)的藏品，麻省哈佛大学福克博物馆(Fogg Museum)的Winthrop收藏品(美国)以及檀香山夏威夷艺术学院(美国)等等。

这些牌饰总是在陵墓中安放于与死者的胸部齐平或非常接近死者的胸部。而且仅在夏代重要人物的陵墓中才被发现，同时大家可以确定与这些人的尸体埋葬的是总是一大堆令人印象深刻难忘，琳琅满目的陪葬品。



牌饰 玫茵堂珍藏





參考書目

查尔斯希格姆斯教授著 Higham C。

- 东南亚地区青铜器时代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 二里头 (1999 - 2006), 第一册, 文物出版社, 北京 2014。
- 偃师二里头 1959年 - 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 1999。
- 早期青铜文化 - 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2008。

徐莘芳, 张光直等著

- 中国文明的形成 - 考古篇附沙拉艾伦序言耶鲁大学出版 2005。

韓維同, 丁伯泉, 張寶德等著

- 河南登封縣玉村古文化遺址概況, 文物參考資料 1954年第六期。

湛中和著

- 夏商时代的社会与文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6年11月第一版。



戴克成先生既是一位成功的古董商,也同时在学术研究成绩昭著。他在学术研究方面成就更超越其他领域。戴克成在学时专攻中国考古学与甲骨文。古至公元前12-13世纪商代的甲骨文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古人刻在兽骨与龟甲上的文字,成为了旷世经典的甲骨文。戴先生在学术界中以他在中国古青铜器,金器的独到心得尤受称许。特别是中国学者对他的成就更加给予特高评价。他的学术研究著作如 *Les Bronzes Archaïques Chinois, Archaic Chinese Bronzes - 1 - Xia & Shang*, Paris 1995, *Ancient Chinese Gold* (巴黎2001),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 (香港2013) 等都备受专家们推崇。戴先生自1985年每年都安排举办一些以商周代青铜器,金器和银器为主题的展览会。